

镇江

出土吴国青铜器

杨正宏 肖梦龙 主编



文物出版社

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

杨正宏 肖梦龙 主编



文物出版社

《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编辑委员会

顾问：张洪水 王 萍

编委会主任：张 兵

副主任：王玉国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玉国 王书敏 王奇志 毛炳江 毛 颖

刘丽文 纪宏伟 肖梦龙

杨正宏 张 兵 张 剑 郑朝平 郭绍全

凌 波 高茂松 龚 良

主 编：杨正宏 肖梦龙

责任编辑：于炳文

摄 影：郑 华

责任印制：王少华

封面设计：张希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杨正宏 肖梦龙.—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010-2597-8

I. 镇… II. ①杨…②肖… III. 青铜器(考古)—镇江市—吴国(? ~前473) IV. K87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2981号

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

杨正宏 肖梦龙 主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河北华艺彩印厂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1194 1/16 印张：13

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597-8

定价：220.00元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李学勤(1)
序言	李伯谦(3)

吴国青铜器的发展序列与地域特征	肖梦龙 杨正宏(6)
-----------------------	------------

附录:

表一: 苏南地区青铜器各元素成分含量	(19)
表二: 江苏丹徒青龙山春秋墓青铜器各元素成分含量	(22)
表三: 苏南地区青铜块各元素成分含量	(24)
表四: 苏南地区 80 件青铜器少量和微量元素含有比例	(24)

图版

丹徒烟墩山宜侯墓

1 兽面纹鼎	(27)
2 宜侯矢簋	(28)
3 弦纹鬲	(29)
4 附耳簋	(30)
5 勾连纹双耳盘	(31)
6 假附耳盘	(31)
7 竖耳撇足鼎	(32)
8 竖耳撇足鼎	(32)
9 蟠龙盖盃	(33)
10 鸟纹觥	(35)
11 角状器	(36)
12 虬杖	(36)

丹徒母子墩西周墓

13 云形鸟纹鼎	(37)
14 雷纹鼎	(38)
15 雷纹鬲	(39)
16 伯簋	(41)
17 双兽首耳簋	(42)
18 勾连纹尊	(43)
19 鸳鸯形尊	(45)
20 提梁卣	(46)

21	双耳鸟盖壶	(47)
22	矛	(48)
23	矛	(48)
24	矛	(48)
25	叉、镢	(49)
26	镞	(49)
27	马衔、镮	(50)
28	车舌、辖	(50)
29	兽首饰件	(50)
30	节约	(51)
31	大型铜泡	(51)
32	中型铜泡	(51)
33	铜泡	(51)
34	小甲泡	(52)
35	垫圈	(52)

溧水乌山西周墓

36	兽面纹鼎	(53)
37	云纹方鼎	(53)
38	提梁卣	(54)
39	附耳盘	(55)
40	戈	(55)

丹徒磨盘墩西周墓

41	单耳尊	(57)
42	夔龙纹匜	(58)

丹阳四方山西周墓

43	附耳盘	(59)
44	小纽钟	(59)
45	兽面纹尊	(60)
46	方卣	(62)

丹阳司徒西周窖藏

47	矮足鼎	(64)
48	弦纹鼎	(65)
49	卷云纹鼎	(66)
50	矮足鼎	(67)
51	弦纹圆锥足鼎	(68)
52	乳丁纹尖锥足鼎	(69)
53	夔纹鼎	(70)

54	环云纹鼎	(71)
55	弦纹鼎	(72)
56	弦纹鼎	(73)
57	弦纹鼎	(74)
58	双夔耳簋	(75)
59	双兽耳乳丁纹簋	(76)
60	双龙首耳簋	(77)
61	兽耳簋	(78)
62	套环耳簋	(78)
63	无耳簋	(79)
64	凤纹尊	(80)
65	突棱腹尊	(82)
66	棘刺纹尊	(83)
67	棘刺纹尊	(84)
68	贴耳盘	(85)
69	附耳勾连纹盘	(85)
70	附耳弦纹盘	(86)
71	圆点纹甗	(86)

高淳下大路西周墓

72	窃曲纹鼎	(87)
73	戈	(87)
74	扉棱尊	(88)

溧水宽广墩西周墓

75	扉棱簋	(89)
76	小耳短足扉棱簋	(90)
77	附耳簋	(90)
78	夔龙纹匜	(91)
79	S形纹匜	(92)

溧水上洋西周墓

80	窃曲纹鼎	(93)
81	圈点纹尊	(94)

武进淹城内城河

82	扁鼓腹尊	(96)
83	三轮盘	(99)
84	牺首匜	(101)
85	三足匜	(102)
86	三足匜	(103)

丹徒青龙山春秋墓

87	云雷纹甗	(105)
88	矛	(106)
89	矛	(106)
90	菱形暗花纹矛	(107)
91	折线暗花纹矛	(107)
92	多戈戟	(108)
93	戈	(109)
94	戈	(109)
95	戈	(109)
96	镞	(110)
97	锥刺纹钺	(111)
98	铜铃	(112)
99	铜泡	(112)
100	车马器(?)	(113)
101	马衔、镡	(113)

丹徒粮山春秋墓

102	S形纹鼎	(114)
103	竖耳三足外撇鼎	(115)
104	竖耳三足外撇鼎	(115)
105	吊耳三足甗	(116)
106	蟠螭纹甗	(119)

丹徒王家山春秋墓

107	带盘鼎	(120)
108	人面纹弧腰罍	(121)
109	虎子	(124)
110	提梁盃	(125)
111	薄胎刻纹盘	(126)
112	薄胎刻纹匜	(129)
113	车舍、辖	(130)
114	车饰件	(130)
115	凿	(131)
116	铤	(131)
117	斧	(131)
118	锯镰	(132)
119	铤	(132)
120	盖弓帽	(133)

121	鍤	(133)
-----	---	-------

丹徒北山顶春秋墓

122	甚六鼎	(135)
123	云纹鼎	(137)
124	勺	(138)
125	蟠虺纹鉴	(138)
126	蟠螭纹缶	(139)
127	尸祭缶	(141)
128	簠于	(142)
129	甚六罍	(144)
130	丁宁	(147)
131	甚六纽钟	(149)
132	悬鼓环	(151)
133	鸠杖	(152)
134	余昧矛	(153)
135	矛	(154)
136	镞	(154)
137	戟	(155)
138	矢	(156)
139	盖弓帽	(157)
140	盖斗帽	(157)

零星出土青铜器

141	钺	(158)
142	直内戈	(159)
143	直内戈	(159)
144	夔龙纹鼎	(160)
145	窃曲纹鼎	(161)
146	乳丁纹簋	(162)
147	几何纹簋	(163)
148	窃曲纹簋形器	(163)
149	圆球腹鳞纹卣	(164)
150	兽面纹卣	(165)
151	戈	(166)
152	戈	(167)
153	戈	(167)
154	戈	(168)
155	戈	(168)
156	戈	(169)

157	戈	(170)
158	戈	(170)
159	矛	(171)
160	矛	(171)
161	矛	(172)
162	矛	(172)
163	甬钟	(173)
164	甬钟	(174)
165	铜块	(176)
166	蹄足聚敛鼎	(177)
167	附耳盘	(178)
168	扁体簋	(179)
169	蟠螭纹鉴	(180)
170	附耳三扁足盘	(181)
171	附耳三扁足盘	(181)
172	云雷纹勾罐	(182)
173	宽带纹钲	(183)
174	勾罐	(185)
175	戈	(187)
176	矛	(188)
177	矛	(188)
178	矛	(189)
179	矛	(189)
180	矛	(190)
181	矛	(190)
182	小矛	(190)
183	窄格扁茎剑	(191)
184	窄格圆茎无箍剑	(191)
185	窄格圆茎无箍剑	(192)
186	无格短剑	(192)
187	宽格双箍剑	(193)
188	暗花鸟纹剑	(193)
189	犁头	(194)
190	犁头	(194)
191	铎	(195)
192	锯镰	(195)
193	锯削	(196)
194	斧	(196)

后记	杨正宏	(197)
----	-----	-------



序 言

镇江博物馆为纪念建馆五十周年,编成《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一书,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印行。蒙博物馆各位先生不弃,要我在这里写几句话。我有机会观察讨论这些珍贵器物已有多年,谈几点陋见向大家请教,自然是应尽的责任。

学术界认识到镇江一带地区存在富于地方特色的青铜器类型,始于1954年丹徒烟墩山青铜器群的发现。其中著名的宜侯矢簋,形制纹饰均与中原同种器物一致,并有时代明属周初的长篇铭文,却和若干明显与中原风格相异的青铜器共出,很快就引起学者们的强烈关注。

烟墩山青铜器群使人们联想到1930年在镇江对岸的仪征破山口出土的另一批青铜器,读者不难在2007年出版的《仪征出土文物集粹》中看到。其特点与烟墩山器群一样,除了地方特色浓厚的几件外,也有中原风格的器物。1959年于该地点征集的一件容器残片上,亦有至少七个字的铭文,时代同样是西周早期。

后来,在镇江地区的其他地点又陆续有青铜器发现,大都有着惹人注目的特异之处。改革开放之后的1985年,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镇江文物精华”展览,并组织了《“镇江文物精华”笔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发表。这次笔谈对于镇江青铜器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见解,例如有学者把当地青铜器划分为中原型、地方化的中原型和地方型,这一观点为后来多数论著所沿用。

学者间的共同认识是,镇江青铜器有着高度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且通过镇江青铜器的分析研究,还能指向中国青铜器研究,甚至对于整个青铜器时代文化有相当大的普遍意义。

这样的问题至少有两个。首先容易想到的,是中原以外青铜器研究的方法论的问题。我曾有一篇小文谈到过,中国青铜器研究历史悠久,自宋代以来学者逐渐构建了分期的传统,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发展序列,学者经过长期研究,现在基本已可以从夏商周一直排列到秦汉,大的发展脉络已清楚。不过,这个发展序列只是中原青铜器的序列,中原之外的地方型青铜器怎样参照这个序列,譬如怎样在镇江青铜器的研究上起作用,还是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

中原以外的青铜器无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里的具体关键是当时这种影响如何传播,传播的速度是否很快。传统的想法是,中原青铜器的文化因素传到很远的地区,比如镇江一代,在当地器物上表现出来,要隔一个时期。这究竟是否是事实,还有待研究论证,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这种传播的速度也不会一样。马承源先生讲过:“吴越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以中原





夏商周青铜器发展的序列来套用,……更主要的是,要从吴越青铜器大量考古资料的实际出发,作具体细致的排比研究,从各种现象中寻求合理的解释,得出真实的正确结论”,这番话我是完全赞同的。

再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历史文献相联系结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镇江青铜器与其他不少地区的地方型青铜器不同,可以说有特别好的条件,因这里出的若干器物铭文国别明确属吴,而吴国的建立和兴亡在文献里有相当多的记载。

1956年,唐兰先生在《考古学报》写了《宜侯矢簋考释》,指出这一周初器物属于吴国。这一精辟见解,经过多年讨论,现今为多数学者接受了。簋铭所提到的“王人”就是周人,“奠(甸)七伯”和“宜庶人”则为当地土著,即文献说的“荆蛮”,这正说明为什么其青铜器群体现出中原与地方文化因素的并存和融合。

我在1985年的那次笔谈中说过:“我国古代的王朝及诸侯国,每每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其考古学意义的文化面貌更为复杂。不管是夏、商、周,还是吴国、楚国、秦国,在其统治范围内,都不会只有一种单纯的文化,……镇江地区的青铜器,就使我们看到不同文化交织融会的图景,这是其珍贵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观《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辑录的大量墓葬和窖藏出土的器物,我们对吴国的这种文化性质会有更深刻的体认。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镇江的考古工作成绩卓著,这部书中列举的近二百件(套)青铜器,时代自周初以至春秋,涵盖了吴国历史的始终,器种繁多,无不有其重要价值,是我乐于向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竭诚推荐的。

李学勤

2008年10月26日夜

于清华园寓所





序 言

为了迎接镇江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以收录该馆馆藏文物为主的《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一书即将付梓,这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谨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

在镇江博物馆五十年发展的历史上,吴文化研究和吴国青铜器的收藏一直是馆里工作的重中之重。1954年,因丹徒烟墩山随葬宜侯矢簋等青铜器的土墩墓的发掘而兴起的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吴文化研究热潮,直接或间接促成了镇江博物馆的成立。自博物馆成立之始,探索吴文化和收藏吴文化遗物很自然就成为该馆的重要课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句容城头山、白蟒台,镇江马迹山,丹徒丁岗断山墩、赵家窑团山,丹徒王家山和凤凰山,丹徒大港乌龟墩、谏壁月湖乌龟山等遗址的发掘;溧水乌山土墩墓,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金坛鳖墩土墩墓,丹徒大港母子墩土墩墓、磨盘墩土墩墓、大港土墩墓、北山顶土墩墓及粮山、王家山、青龙山、四脚墩等土墩墓的发掘,镇江博物馆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或主持者。1982年,经过时任镇江博物馆馆长的陆九皋等诸位先生的协调奔走,江苏吴文化研究会成立。1984年,镇江博物馆便主办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吴文化学术讨论会,吸引了省内外众多研究者与会。作为吴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骨干力量,陆九皋馆长和馆内刘兴、肖梦龙、刘建国等先生所提交的论文或者发言所阐述的观点,因为有自己亲自发掘和整理的材料作依据,倍受与会学人的注意。作为上述许多遗址和墓葬发掘现场的参观者,作为吴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和镇江博物馆主办的吴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参加者,这些虽然都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但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言犹在耳。经过学术界二十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这里要特别提到镇江博物馆考古界同仁们付出的辛劳,使吴文化研究取得了重大收获。在我看来,这些收获主要是:确认了吴文化自宁镇地区发源然后向东和其他方向逐步扩展的发展趋势;发现了一大批吴文化发展历程中不同时段的重要遗址和墓葬,总结出了吴文化的特征和演变轨迹;基本梳理清楚了吴与中原、吴与楚、吴与越等文化的异同与文化交往关系;揭示了吴国社会结构特点和走向文明的独特道路,以及其在形成中华一统文明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了解了吴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了吴文化研究已经取得的成绩,回头来再看这部新出版的《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的确是一部具有坚实科学基础的、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足以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吴文化的特征和其发展历程及发展高度的重要著作。

首先看其选材。在收入图录的近200件(套)铜器中,约150件(套)有明确出土单位,主要是墓葬,个别为遗址或窖藏。其余的,43件有明确出土地点;13件为废品收购站拣选,拣选者虽无具体





出土地点,但其范围也不出于废品收购站所在的县域或邻近各县。这就保证了入选器物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排除了像有些图录出现的某些器物真膺或文化归属同异的争论的可能。

第二看其编排。该图录没有采用常见的先按器类再分时代先后排序的做法,而是引入考古学上的“组合”、“共存”等概念,先分大的时代再按出土单位排列器物,从而为读者提供了相对而言较完整的、存在内在联系的研究资料,进一步增强了作为研究素材的科学性。

第三看其器物说明。除了名称、尺寸大小、形制花纹描述、出土时间、出土单位或地点,还特地注明了现在收藏单位,为想观摩实物的读者提供了指南。对于那些从废品收购站拣选的铜器,还注明了废品收购站所在的县市,为某些对这类器物想进一步追索其来龙去脉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第四看其器物年代定位。该图录只分为商晚、西周和春秋三个大的时间段,看似粗疏,但实际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裁定。因为,尽管有些图录的编纂者除商代晚期又将西周、春秋细分为若干段,但实际上对一些铜器包括出土铜器的墓葬的年代是有不同意见的,例如,对宜侯矢簋和出土宜侯矢簋的土墩墓的年代的看法即不尽相同。现在这样处理,既保持了其合理性,又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应有的空间。

第五看其墓葬性质判定。收入图录的大部分青铜器尤其是有铭文的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大型土墩墓中,其中有些据其规模、形制、随葬器物及有无殉葬人、陪葬墓等判断,确为王一级的墓葬。有的研究者,包括该书的作者肖梦龙先生在内,在自己有关研究论文中,已经推定出宜侯矢簋的墓即宜侯矢墓,出伯簋的大港母子墩墓或即吴国第六代国君熊遂之墓,青龙山春秋中期偏晚大墓或即吴国第一个称王的吴王寿梦之墓,出“甚六”、“尸祭”铭文铜器的北山顶春秋晚期大墓或即吴王余昧之墓。但在编辑该图录时,除了采纳郭沫若、唐兰、李学勤诸位先生的意见将出宜侯矢簋的墓迳指为宜侯墓外,其余均只标出时代,而未提及自己推断的可能的墓主。这并非否定自己的结论,也并不表示没有这种可能。这样处理,恰恰反映了作者的慎重。正像在定位器物年代时为读者留下应有的空间一样,在判定墓葬性质时也为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思考余地。

第六该书附录中收入了苏南地区出土的200余件青铜器各元素成分含量检测数据,这对研究吴国铜器的合金及特质,提供重要研究资料。

而就铜器本身而言,通过综述和器物说明,特别是精美的图像,我们更可以清晰地看到吴国青铜器所独有的特征。正像综述所已经指出的,吴国青铜器从西周至春秋都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组群,一个组群是典型的中原周式铜器,如丹徒烟墩山土墩墓出土的宜侯矢簋、大港母子墩土墩墓出土的伯簋等,该群铜器数量少,而且主要见于西周早、中期,其铸造地点不在吴地,而在中原;一个





组群是仿中原周式铜器,如丹徒烟墩山土墩墓出土的兽面纹鼎、弦纹鬲、附耳簋,溧水乌山一号墓出土的变形兽面纹鼎、二号墓出土的卷云纹方鼎,丹徒大港母子墩土墩墓出土的云形鸟纹鼎、雷纹鼎、雷纹鬲、勾连雷纹尊、鸟形盖组提梁卣,丹阳司徒砖瓦场窖藏出土的夔纹鼎、环云纹鼎、双兽耳乳丁纹簋、棘刺纹尊、附耳勾连纹盘、弦纹盘,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出土的云雷纹甗等,器形总体特征类似中原同类器,但纹饰往往经过变形或为本地所独创,该群铜器数量最多,全部为当地铸造;一个组群从形制到纹饰皆为当地特点的铜器,如丹徒烟墩山土墩墓和粮山土墩墓等出土的竖耳撇足铜鼎,烟墩山土墩墓出土的蟠龙纹盃、角状器,丹徒母子墩土墩墓出土的鸳鸯形尊、双耳鸟盖壶、丹阳司徒砖瓦场窖藏出土的乳丁纹矮锥足鼎,丹徒王家山春秋大墓出土的兽形虎子、丁宁、锯镰,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出土的折线暗花纹矛、菱形暗花纹矛等。该群铜器总体数量位居第二位,但从早到晚呈逐步增加的发展趋势。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那组铜器都是随时在变的,不仅形制在变,花纹在变,数量也在变,作为第二组群的仿制铜器,到春秋晚期,随着吴与楚交往的增多,受楚的影响,也开始仿制楚器,丹徒粮山春秋大墓出土的S形带盖鼎,即是明显的楚式铜鼎风格。

《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一书的出版,展现了具有创造性的吴国青铜器的风采,标志着吴国青铜器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读到它的读者,不仅会得到艺术享受,也将由此而扩大瞭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如果你是一位吴国青铜器爱好者、研究者,你也将由此受到启迪,促使你在研究上向更深层次迈进。不过,我也想在此指出,吴国有从商代晚期立国至春秋末年被越所灭的历史长达七百多年,领土范围曾涉及江苏、安徽、江西、上海、浙江、山东乃至湖北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其政治中心随政治军事形势变化也屡有迁移。因此,镇江辖区内出土的吴国青铜器,并不能反映整个吴国青铜器的全貌,根据镇江辖区内出土青铜器的墓葬或遗址的研究作出的某些关乎吴文化、吴国历史的论断,也难以回答吴文化和吴国历史上的所有问题。有鉴于此,我愿借此机会向关心吴国青铜器研究、关心吴文化研究的有关人士和朋友们呼吁,在各省市、各单位工作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吴文化研究会的作用,制订切实可行的发掘和研究规划,提倡不同观点、不同学派间的切磋和讨论,加强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的交流,把吴国青铜器研究、吴文化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是为序。

李伯谦

2008年10月于北京





吴国青铜器的发展序列与地域特征

肖梦龙 杨正宏

吴、越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中国东部长江下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吴、越文化与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并称为长江流域古代三大文明。

吴是周人和江南土著民族相结合而形成的诸侯国,商晚周初在太伯、仲雍奔荆蛮创建“勾吴”时,一方面“端委,以治周礼”^[1];另一方面又入乡随俗,“断发文身”^[2]。所以吴文化是由华夏文化和土著“荆蛮人”文化相融合形成的区域性文化,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地方特征,如体现在江南出土的吴国青铜器上,其面貌具有两重性,既受中原商周文化的深刻影响,又表现出显著的地方文化色彩和风格。

吴国青铜器群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土过,如江苏仪征破山口西周墓^[3]。此后50年代更有两次重要发现,一是镇江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墓青铜器,其中特别引起考古学界和史学界重视的是铸有近120字铭文的宜侯矢簋。我国已故考古和古文字大师郭沫若、唐兰以及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等,都曾撰文指出“簋系吴器”^[4]。宜侯矢簋是目前所见吴国最早的一件铸铭铜器,它对研究吴国早期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再就是皖南屯溪西周土墩墓出土的大批铜器^[5],都展示出吴文化青铜器的内涵特色。20世纪60年代六合程桥1号墓的“攻敌”编钟,是在江苏境内首次发掘出土的吴国晚期带铭铜器^[6]。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江南地区广泛分布的湖熟文化遗址和土墩墓,开展了全面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7],从而对吴文化的探索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近些年来出土吴国青铜器的不断增多,从而使人们眼界大开,认识逐步深化,吴国青铜器研究亦成为专门课题。本文根据现已拥有的比较丰富材料,从吴国青铜器的时代分期、类型与特点剖析入手,揭示它的自身演化规律和发展序列。

江南地区青铜器铸造,有其发生、育成、发展和繁荣的历史演变过程,根据进化中所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可划分为先吴时期、吴国前期、中期及后期四个阶段进行考察。

一 夏商先吴时期江南青铜器铸造的初级阶段

根据目前考古资料,江南地区在夏商之际进入青铜时代。在宁镇地区相当夏代的点将台文化,如句容城头山和朝墩头遗址发掘中,都曾发现过青铜炼渣,但未见青铜器。故有学者认为,“尽





管如此,青铜炼渣的出现,应为一个质的变化,标志着其时已有可能进入了青铜时代,至少也应是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青铜文化之间的过渡性文化。……属青铜文化的萌生期”^[8]。

相当中原商代的宁镇地区湖熟文化和太湖地区马桥文化^[9],都发现有青铜器出土,特别是湖熟文化中,与青铜器同时出土了铸造青铜器的用具。至迟商代江南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无疑。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比较普遍地发现于湖熟文化遗址,如经发掘的南京北阴阳营(三层、二层),句容城头山(五层),江宁点将台(中、上层),胥庙(中、上层),丹徒团山(十、九、八层),以及南京安怀村、太岗寺,镇江马迹山、癞鼈墩等^[10]。经常见有铜刀、镞、斧、凿、钻、鱼钩及矛,在句容赤山湖周围还出土过戈和钺。江宁铜乡出土过三羊罍,铜陵西湖乡出土过罍和爵等。特别是在遗址中发现冶铸青铜器的遗存,如铜矿石、铜炼渣以及注口溢出的青铜块等,在北阴阳营出土了炼铜坩埚和挹灌铜液用的陶勺。这些出土实物资料的广泛发现说明,青铜冶铸在当时江南地区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聚落手工业。

综观这一时期江南青铜器铸造特点:

(一) 冶铸青铜器的遗存虽有比较普遍地发现,但非常分散,规模甚小,如北阴阳营出土炼铜坩埚直径只有17厘米。

(二) 青铜制品的种类不多,主要是小件工具和兵器,容器类极少见。铸作比较粗糙,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三) 器形大都是照样模仿殷商,表明受商文化影响。但也有的器物形制具有地方特点,如句容葛村出土的铜钺,钺体呈圆形,圆弧刃,明显是当地新石器时代流行的石钺形制的演化,而与中原商代常见钺体长方或正方形形式相异。爵的造型亦比较特别,在流的近根处立一柱。罍和爵皆不施地纹。铜质成分经测试都含有一定量的铁,应是采用当地的黄铜矿(CuFeS_2)就地铸造的。

(四) 青铜冶铸工具坩埚和陶勺,都为夹砂红陶。坩埚形制作釜形,器壁厚,内壁附有残留的青铜渣;挹铜汁浇注用具陶勺,一侧有流,勺下前部有两矮足,后为粗短柄,中有方釜,可装木柄。比之中原商代使用的炼铜工具灰陶大口尊、红陶大口缸、将军盔和炼炉等有所不同,说明湖熟文化在炼铜方法上的鲜明的地域特点,原有着不同的技术传统。对此,曾昭燏、尹焕章先生在《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一文中作过详尽论述^[11]。

总之,这些出土资料反映江南地区在先吴湖熟文化时期,已经较为普遍地兴起了自己地方上的青铜冶铸业,尽管它还处于水平比较低下的初级阶段,但它是孕育吴国青铜文化的母体,是江南青铜冶炼史上开辟草莱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以后光辉灿烂的吴国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吴国前期青铜器铸造的飞跃发展

吴国前期的相对年代约当中原西周早、中期。由于太伯、仲雍一班周人南下,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文化,传授荆蛮,为进一步开发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勾吴”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更加促进了江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史载“数年之间,民人殷





富”。见于考古学资料的印证,西周初年,土著湖熟文化呈现发达景象,同时新兴起土墩墓埋葬制度^[12]。随着吴文化特征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的烧制进入繁荣时期,青铜器铸造也出现飞跃的发展。所见这一期间出土青铜器,非但在数量上,而且在种类与制作质量上都大大改观。

这一时期出土青铜器主要见于吴国奴隶主贵族阶层的土墩墓中。典型器群,大型墓有镇江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母子墩墓,丹阳访仙四方山墓,仪征破山口墓及屯溪一号墓等;中小型墓以溧水乌山一、二号墓为代表。另外,还有丹阳司徒窖藏铜器中的西周早、中期器等^[13]。

对于这一时期江南吴国青铜器特征,主要从其类型、形制、纹饰和器物组合以及合金、铸造等方面进行探索。

吴国前期青铜器明显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中原铸造的舶来品,称之“中原型”。目前见有器包括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出土的矢簋、母子墩墓的伯簋,屯溪一号墓的“鬲父己尊”和三号墓的公卣,以及破山口墓的“子作父宝鼎”几件器物。这类器无论在其铸造、器形纹饰特征和铭文的内容、书体及刻铸部位等方面,都无可区别于中原习见的器物,可明确断定为中原传入江南的铜器。这类型铜器在江南出土铜器中所占数目极少,同时只有在大型土墩墓中才偶有所见。这类墓主身份当属吴国最高统治阶层的周人,所以在其墓中见有中原铜器当在情理之中。

第二种类型为江南地方铸造的仿中原铜器,称之“融合型”或仿造型。这类器出土数量最多,是吴国前期青铜器的主流。这也说明此期间西周文化对江南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但是江南的青铜工匠们在仿造中原铜器时,也并非一成不变地照搬其原样,而是在器形纹饰等方面多加变化,使这类青铜器的整个面貌特征,乍看起来似乎像中原铜器,但细察之则具有许多地方色彩和自身风格。这生动地反映了文献记载的吴国统治者是周人,人民为荆蛮的历史真相。下面试举一些具体器例说明之。

鼎

仿造中原的有圆鼎和方鼎,圆鼎如丹徒大港宜侯墓一件、母子墩墓二件以及溧水一号墓鼎,都作西周早期流行的直耳、柱足、垂腹形制;但腹上纹饰完全为地方特色,均以粗细不一的阳线条形式组成简化变体的饕餮纹、鸟纹或云雷纹等图案。方鼎见之溧水乌山二号墓,器体单薄,直耳、柱足、四角起扉棱,腹部饰两排螺旋形单线云雷纹,这在中原同类器中是从未见过的。

簋

如母子墩墓双兽首耳簋(图版17)和丹阳司徒窖藏中的Ⅰ、Ⅵ式簋(图版59),都是仿造中原形式但又富于变化的典型器件。双兽首耳簋唇沿细卷,口至腹成直筒形,和同时期中原簋的侈口、翻沿、鼓腹形制相殊异;在纹饰上,腹部主体仿中原流行的饕餮纹,但简化变体,构图变得稀疏简略,没有双目,不施地纹,已失去它原来的繁缛诡秘性,与中原对照面目全非矣。丹阳司徒Ⅰ、Ⅵ式簋腹扁鼓,Ⅰ式簋的斜格乳丁纹的乳丁呈圆凸状,有别于中原的尖锥状乳丁;Ⅵ式簋由圈点纹、圆点纹和变体夔纹带组合而成的纹饰,则完全为地方特点,是中原根本没有的。

